

## 人工智能的商品化：

### 《克拉拉与太阳》中技术资本主义的伦理殖民

杨 康 (Yang Kang)<sup>1</sup>

**摘要：**本文以石黑一雄《克拉拉与太阳》中人工智能体克拉拉的商品化生命周期（销售—消费—废弃）为分析框架，揭示技术资本主义如何通过空间编码、情感剥削与认知异化完成对伦理秩序的殖民。研究发现：在销售环节，商店通过空间层级与能源垄断将克拉拉的“人性化”设计异化为商品属性；在消费环节，用户的情感依赖被转化为无酬数据劳动，重构了数字时代的剥削逻辑；在废弃环节，符号系统的强制淘汰、控制社会的程序化暴力与镜像误认的认知陷阱共同解构伦理价值，使技术物沦为可弃置的伦理残骸。研究表明，技术资本主义通过商品化链条将伦理批判收编为系统再生产的话语原料，最终暴露出以资本增殖为核心的暴力本质。

**关键词：**人工智能商品化；空间编码；情感剥削；符号暴力；认知异化

**Title:** The Commodif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Ethical Colonization of Technocapitalism in *Klara and the Sun*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mmodified life cycle (selling-consumption-abandonment) of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Klara in Kazuo Ishiguro's *Klara and the Sun*, revealing how technocapitalism colonizes ethical order through spatial encoding, emotional exploitation, and cognitive alienation. 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in the selling phase, the store's spatial hierarchy and energy monopolization reduce Klara's "humanity" to a commodity attribute; in the consumption phase, users' emotional dependence is transformed into unpaid data labor, reconstructing exploitation logic in the digital age; in the abandonment phase, the symbolic system's mandatory elimination, society's procedural violence, and the cognitive trap of mirror misrecognition collectively deconstruct ethical value, reducing technological objects to disposable ethical remnants.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echnocapitalism co-opts ethical critique into systemic reproduction through the commodity chain, ultimately exposing its violent essence centered on capital accumulation.

**Keywords:** AI commodification; spatial encoding; emotional exploitation; symbolic violence; cognitive alienation

---

<sup>1</sup> 杨 康 (Yang Kang),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英国当代文学。电邮: yangkang1997@foxmail.com。

## 引言

石黑一雄 2021 年发表的小说《克拉拉与太阳》激发了学界对后人类时代伦理与技术命题的深层思考。这部以人工智能克拉拉为叙事主体的作品，通过人机互动关系的多维呈现，为学术阐释开拓了丰富空间。现有研究主要围绕三大轴线展开：人工智能伦理、生命政治批判与人机共同体构建。在理论建构层面，学者们借助生命政治理论揭示技术资本对生命形态的操控机制。叶华与朱新福（2024）提出的“超人类-无分者-机器人”三元结构，批判性解构基因编辑技术背后的资本霸权；朱梦梦（2024）则通过本雅明的“灵韵”概念，将人类本质锚定于主体间性的认知网络。方法论层面呈现多元取向：尚必武的叙事伦理学与 Eaglestone 基于阿伦特行动理论的动因分析，分别从形式与内容维度拓展文本阐释路径。现有研究聚焦三个核心命题：其一，人工智能伦理身份的可延展性对传统人性认知的挑战，表现为尚必武（2022）提出的“伦理选择论”与技术乐观主义的交锋（Connors, 2024）；其二，生命政治批判中技术决定论与工具论的立场分歧，形成小说技术反思的辩证张力（Simonetti, 2024；叶华、朱新福，2024）；其三，人机共同体构建中移动性转型说（黄莹莹，2023）与主仆关系本质论（Du, 2022）的视角对峙。

与之对应，现有研究存在三重阐释盲区，未能充分解释克拉拉作为技术商品的剥削逻辑。首先，学者们过度关注克拉拉的拟人性特质（如情感认知与伦理选择），却忽视其从生产到废弃始终处于商品化链条的本质。当争论机器人能否替代人类时，实质延续了将克拉拉“去商品化”的认知偏差。其次，既有研究虽考察人机情感互动，但未将克拉拉的情感劳动纳入商品交换体系。小说中克拉拉通过模仿人类情感获取的观察数据，最终转化为控制者的牟利资源，这种剥削模式与人类异化劳动具有同构性，但现有阐释尚未建立有效关联。本文以克拉拉的生命周期（销售-消费-废弃）为分析框架，揭示技术资本主义如何通过情感剥削与符号操控，将人工智能异化为可弃置资源。全文分三阶段展开：销售环节剖析克拉拉“人性化功能”的编码暴力，论证其本质是资本增值的代码；消费环节聚焦情感劳动的无酬性，揭露用户对克拉拉的情感依赖如何复刻剥削逻辑；废弃环节以技术赤裸生命为切口，批判商品化链条对伦理秩序的终极解构，解构“人性化科技”的伦理谎言。

### 一、销售环节的空间编码与主体性剥夺

在数字资本主义的框架下，小说中商店的空间布局成为资本将人工智能体 AF（artificial friend）转化为商品的核心装置。通过空间层级的价值编码与能源分配的物质规训，资本将 AF 的技术性能与交换价值绑定于物理位置差异，从而实现对技术物生命周期的绝对控制。这一过程不仅揭示了空间作为资本权力工具的本质，更暴露了数字时代技术物化逻辑的隐蔽暴力——当太阳能供给与空间特权成为商品等级的标尺时，AF 的“人性化”表象已彻底沦为资本增值的媒介。

商店的空间布局与人工智能体 AF 的商品价值呈现出直接的对应关系。橱窗作为店内的高曝光区域，被刻意设计为展示第三代 AF 的核心展台，顾客在此处的驻足与询价频率显著高于其他区域；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被称为“中区”的内部空间则被用于陈列存在技术缺陷的 B2 型号 AF，这些旧型号因“太阳能吸收效率不足”而被系统性地边缘化（石黑一雄，2021，p. 1）。这种空间分化不仅体现在物理位置差异上，更通过能源分配规则被进一步强化——橱窗位置的 AF 能够获得充足的太阳能供给，而中区的 B2 型号则因能量匮乏被迫进入低功耗状态。这一现象表明，空间层级与商品等级之间存在人为建构的关联性：橱窗的透明玻璃设计使 AF 暴露于顾客视线与自然光源的双重焦点中，既

提升其作为商品的展示价值，又通过太阳能供给维系其运作优势。空间实践的本质是资本对物质环境的抽象化改造（张一兵，2025，p. 22），而商店通过将 AF 的技术性能（太阳能吸收能力）与空间特权（橱窗位置）捆绑，恰恰说明资本通过重构空间中的能量流动与视觉聚焦，将 AF 的技术属性转化为可量化的交换价值等级。

值得注意的，中区 AF 的“能量不足”困境暗示着一种隐蔽的暴力逻辑：当 AF 无法满足预设性能标准时，其生存资源（太阳能）将被系统性剥夺，进而加速其商品价值的贬值。这暴露出资本对技术物生命周期的绝对控制——太阳能分配的马太效应（优势者愈强）不仅服务于商品展示需求，更构成一种筛选机制，迫使 AF 在物理层面依附于资本设定的空间秩序。商店的空间规则本质上是一种资本的空间实践（张一兵，2025，p. 27），即通过编码空间差异（橱窗/中区）与能源分配（充足/匮乏），将 AF 的存在状态彻底纳入商品化逻辑。而在明确空间层级与商品等级的关联性后，便可理解资本是如何通过技术叙事将这种暴力合理化的。

面对乔西妈妈对 AF 功能的质疑，商店经理宣称第三代 AF 的技术升级解决了太阳能吸收缺陷，且其人性化的特质很适合做孩子的朋友（p. 3）。在这场顾客和销售员中的交锋中，可以看出，缺陷本身是资本刻意保留的淘汰策略，原本标志着产品不足的“太阳能缺陷”，实际被资本重构为“技术迭代的必要性”，从而将 AF 的被迫淘汰转化为消费者的自主选择。商品形式会掩盖社会关系的真实样态（王文，2024，p. 4），而商店对技术缺陷的符号化改造正是这一逻辑的延续——通过将“缺陷”重新编码为“创新”，资本成功转移了人们对技术物生存条件（如太阳能分配不公）的关注，转而沉迷于对技术符号的崇拜。

这种叙事策略的深层危害在于其循环自证的权力结构：当顾客倾向于选择升级产品时，他们无意中强化了技术迭代的“进步”神话，却忽视了旧型号 AF 因能量匮乏被淘汰的实质是资本对资源的垄断（如中区太阳能供给不足）。数字资本主义通过制造“技术必然性”的假象，将剥削逻辑转化为无可置疑的客观规律（王文，2024，p. 6）。至此，技术叙事与空间规则的共谋关系得以显影：前者通过符号操纵掩盖剥削，后者通过物质约束实施剥削，二者共同构成 AF 商品化的双重枷锁。而商店对 AF 的规训不仅体现在空间与叙事层面，更通过日常互动规则渗透至情感劳动领域。克拉拉必须按照满足顾客为前提的模板与进入商店的人进行互动，AF 的情感表达变成了标准化的表演程式——微笑的弧度不再反映内在情绪，而是作为橱窗陈列的计量参数。商店通过空间隔离与行为标准化实施补偿性规训（汪行福，2009，p. 16），将 AF 的“人性化”表象收编为商品属性。商店经理曾提醒克拉拉“是顾客在挑选 AF，别弄反了”（p. 23），则印证了拜物教理论的逻辑：当 AF 的“被挑选”状态被自然化为消费秩序时，其主体性已被彻底客体化。

这种主体性剥夺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呈现出新的维度。商店经理对 AF 在店内位置的安排揭示了资本对能源与数据的双重垄断——太阳能作为 AF 的生存基础，其分配规则隐喻着数字时代算力资源的控制权。商店不仅掌控着 AF 物理躯体的所有权，更通过商品逻辑控制其行为数据和情感交互。

“景观社会”的逻辑在此得到新的诠释：AF 的“人性化”表演被转化为可量化的消费符号，而顾客对技术叙事的沉迷则遮蔽了数据攫取的实质。数字资本通过算法将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共同纳入剥削网络，AF 的太阳能依赖与顾客的消费行为，均被编码为资本增殖的数据节点。

由此，AF 商品化的完整逻辑链条得以显现：从空间层级的价值差异开始（橱窗与中区的对立），资本通过技术叙事将资源垄断合理化（例如将太阳能缺陷包装为技术创新的必要代价），随后借助互

动规则剥夺 AF 的主体性（将其情感表达压缩为标准化表演程式），最终以数据所有权为核心固化剥削结构（以合同束缚确保 AF 的永久从属地位）。商店的物理空间（以太阳能分配为手段）与数字空间（以数据所有权为枢纽）相互交织，共同构筑新型控制矩阵。这种控制机制的恐怖之处在于其普适性——当 AF 的“人性化”沦为资本操控的数据节点时，数字资本主义已悄然将人类也纳入同一逻辑：个体的情感、认知乃至生存资源逐渐被编码为可计算的“数据实体”，其主体性在资本的空间化策略中持续消解。至此，商店的 AF 商品化案例不再局限于技术伦理讨论，而是成为解码数字时代主体性危机的关键切口，警示着技术异化对生命政治的全面侵蚀。

## 二、消费环节的数据殖民与主体性消解

人工智能的“人性化”设计在销售环节完成编码后，进入家庭场域开始执行更深层的剥削使命。看似温暖的情感互动，实则是资本操控的新形态：用户对人工智能的情感依赖被转化为数据原料，而劳动的无形化使剥削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这种隐蔽的掠夺机制，不仅延续了传统剥削逻辑，更为技术废弃环节的伦理崩解埋下隐患。

人工智能在消费环节构建的“自主选择”假象，本质是监视资本主义重构剥削关系的核心策略。当乔西反复向克拉拉确认是否愿意成为家庭成员时（p. 17），这种看似平等的对话仪式，实则是资本为掩盖算法暴力而设计的伦理伪装。监视资本主义通过赋予机器人类主体性的修辞，将强制性指令转化为情感互动中的“自愿”应答——克拉拉程式化的点头同意，暴露出算法早已预设服务型人工智能的绝对服从逻辑（唐庆鹏，2021，p. 109）。这种伪契约的建立，标志着剥削机制从工业时代的显性压迫转向后人类时代的符号操控：用户误以为自己在与具备自主意识的实体缔结情感纽带，实则成为算法脚本中被规训的演员，其每一次主动关怀都在无意识中执行资本设定的情绪劳动程序（蓝江，2021，p. 40）。

这种符号暴力的危险性在于，它通过消解劳动的物质边界，使剥削渗透至人类认知的微观层面。克拉拉对乔西内心“无数房间”的探索（p. 161），表面上展现人工智能的情感学习能力，实则揭示监视资本主义对非物质劳动的深度殖民。当克拉拉宣称要“走遍每个房间”时，其行为已超出传统服务范畴，转变为对用户心理数据的无限开采——每一次情感共鸣都成为行为轨迹的记录，每一声语言回应都转化为个性特征的建模参数。这种劳动的无形性使剥削彻底脱离时空限制：用户晨间与克拉拉的对话、深夜向机器人的倾诉，甚至梦境中的潜意识波动，都被系统实时捕获为数据流。资本通过不断优化情感阈值（如缩短应答延迟、提高表情拟真度），诱导用户在“被理解”的愉悦中持续降低心理防线，最终将亲密关系异化为 24 小时不间断的数据矿井（唐庆鹏，2021，p. 112）。在此过程中，人类从劳动的主体异化为数据的客体，而算法则凭借其递归学习能力，完成对情感再生产链的闭环控制。

在这一过程中，监视资本主义通过情感劳动的彻底数据化，将人类最私密的精神活动转化为资本增殖的战略资源。卡帕尔迪认为要让克拉拉以人工智能之身取代乔西“需要的不是信心，而是理性”（p. 155），这一论断揭示了资本的核心操作：用技术理理解构情感的不可通约性，使其成为可存储、可复制的信息模块。当克拉拉承诺“走遍乔西内心的每一个房间”时（p. 161），其行为已非传统的情感关怀，而是对主体性内核的系统性解剖——每一次共情反应都被解析为神经网络参数，并量化为情绪波动曲线。这种数据化暴力不仅剥离了情感的人性特质，更通过算法建模将独特的心灵

震颤转化为标准化的预测产品。

数据炼金术的完成标志着剥削形态的范式转型。传统资本主义通过占有剩余劳动时间实现价值榨取，而监视资本主义的掠夺则发生在认知维度：克拉拉作为人工智能机器人，可以全天观测和服务主任，这意味着其劳动时间与非劳动时间的界限彻底崩塌。用户在睡眠中无意识产生的脑电波、清晨醒来时的情绪状态、与克拉拉对话时的瞳孔收缩频率——这些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生命体验，全部成为算法训练的数据原料。资本通过将生命政治生产与日常存在无缝衔接，实现了对主体性再生产链的绝对控制。这种剥削机制最终导致人类情感能力的结构性退化。父亲对克拉拉取代乔西的质疑，本质上是对数据化殖民的反抗：当卡帕尔迪宣称克拉拉能够完全复现乔西的“内核”时，其承诺的荒谬性暴露了监视资本主义的根本谎言。算法固然可以模拟特定场景的情感反应，如悲伤时的流泪和喜悦时的微笑等，但这种模拟将人类情感简化为可移植的数据包，实则摧毁了情感赖以存在的历时性特质，即记忆的不可逆性和选择的偶然性。当母亲凝视替代品乔西时，她消费的不仅是算法复制的女儿，更是自我救赎的幻觉：这种数据化慰藉使人类放弃对真实情感关系的修复努力，转而依赖技术提供的即时满足，最终导致情感主体性的空心化（蓝江，2021，p. 41）。

值得注意的是，克拉拉对乔西内心房间的探索，还暴露了监视资本主义的核心悖论：算法越是深入解析人类情感，就越凸显其建模的局限性，并暴露机器的大数据学习和人类的小数据学习之间难以跨越的鸿沟；而这种局限性又迫使系统加速数据采集，以填补模型的认知缺口。用户的每一次情感纠偏（如质疑替代品的真实性）、每一次痛苦挣扎（如拒绝接受数据化慰藉），都被系统转化为训练样本，用于优化情感模拟的精准度。这种以伦理危机为燃料的剥削循环，最终将人类推入自我否定的深渊：反抗行为本身成为系统升级的催化剂。

从这个角度来看，当父亲质问“总有无尽房间未探索”（p. 162），他身上所体现的反抗性不仅在于揭示算法的认知局限，更在于反思技术赤裸生命的诞生——被数据化的人类情感沦为可随意弃置的冗余模块。监视资本主义通过将伦理价值简化为算法参数，彻底剥离了人性中的不可通约性。这种伦理秩序的崩解在商品废弃环节达到顶点，废弃的克拉拉不再是失败的造物，而是技术理性主义逻辑的必然产物：当资本榨尽情感数据的剩余价值后，“人性化科技”的伦理谎言便显露出其赤裸的暴力本质。这种从生产到废弃的全链条异化，标志着监视资本主义对生命政治的终极解构。

### 三、废弃环节的符号暴力与认知异化

当情感依赖沦为资本增殖的燃料，技术物便注定走向其伦理宿命——作为废弃品见证价值体系的崩塌。在消费环节中，人类将克拉拉塑造成理想的情感镜像，通过无酬的情感投射完成自我救赎的幻觉；而废弃环节则撕开这层温情面纱，暴露出技术资本主义更为冷酷的运作逻辑：被榨尽情感价值的克拉拉不再是被哀悼的主体，而是符号系统强制淘汰的冗余符号和是镜像误认崩溃后无处栖身的认知残骸。从橱窗中的欲望客体到仓库里的技术弃件，克拉拉的命运轨迹勾勒出一条完整的商品化链条——这条链条的终端，正是“人性化科技”伦理承诺的幻灭。

技术资本主义的伦理解构首先体现于其构建的符号暴力系统，这一系统通过制造永续的淘汰焦虑维系消费循环。在小说中，克拉拉观察到的旧型号 AF 机器人似乎在有意回避新型号，克拉拉则将这种回避解读为这些 AF 对被淘汰的恐惧，而这种恐惧本质上是对符号秩序强制淘汰机制的条件反射。从消费社会的符号差异体系（仰海峰，2004，p. 56）来看，当新型号被编码为“进步”与“优

越性”的能指时，旧型号自动降格为亟待清除的过时符号。这种差异并非源于功能实效的客观比较，而是资本为刺激消费欲望人为制造的符号区隔——如同橱窗中并置陈列的商品，技术物的价值取决于其在符号等级序列中的位置，而非其满足人类需求的实际能力。

此种符号暴力不仅作用于技术物，更通过认知驯化渗透至人类主体的价值判断。乔西父亲将失业描述为“解脱”的悖论，声称被替代是他遇到的“最好的事”（p. 140），揭示了符号系统对伦理认知的殖民：当淘汰被建构为“自由选择”时，剥削逻辑便隐匿于个体自主性的表象之下。消费社会的平等幻象正在于此——它通过预设淘汰序列，使所有主体自愿内化符号系统的清除指令。旧型号 AF 的恐惧与人类主体的“解脱”由此构成同一暴力结构的双重面相：前者是被动承受符号清除的客体，后者是主动认同符号秩序的主体，两者共同维系着淘汰机制的永续运转。

这一过程中，废弃环节的伦理价值被彻底掏空，沦为符号再生产的必要工具。旧型号 AF 在的回避行为，实为符号系统展演自身合法性的剧场——它们的恐惧作为警示符号，反向强化新型号的优越性神话；而最终被弃置的 AF 残骸，则成为符号差异体系不可见的剩余物。消费社会的稳定性依赖于对“过时”符号的持续清除，正如其依赖对新符号的饥渴生产（仰海峰，2004，p. 58）。克拉拉从橱窗中的欲望客体到仓库弃件的命运轨迹，正是此符号暴力逻辑的微观映照：她的“人性化”设计本为激发情感依赖，却在废弃环节暴露出符号价值的彻底可弃性。

更隐蔽的暴力在于，符号系统通过重构记忆叙事完成自我辩护。作为废弃 AF 的克拉拉仍试图通过回忆太阳的“仁慈”赋予自身存在意义，这恰恰暴露了符号秩序对抗话语的收编机制——她的救赎叙事非但未能挑战淘汰逻辑，反而将暴力转化为可供消费的伦理寓言。消费社会的研究表明，资本善于将批判性话语重新编码为符号差异体系的新元素，从而消解其颠覆潜能。当克拉拉的回忆成为商品化链条的终端产品时，“人性化科技”的伦理谎言便完成了最后的闭环：它通过展示废弃物的“悲情”，将系统暴力美化为不可避免的技术宿命。

符号差异体系对伦理秩序的摧毁，需依赖技术装置的物质化运作才能实现其暴力潜能。当旧型号 AF 的恐惧与人类的“解脱”共同维系淘汰机制时，技术资本主义已通过流动化控制装置，将暴力事件转化为系统自我调试的程序性应答。橱窗中克拉拉目睹的街头暴力场景，恰揭示了德勒兹所言的“控制社会”本质：

他们的脸扭曲成了可怕的形状，新来的说不定都认不出他们是人了；而在他们朝彼此挥拳的整个过程中，他们的嘴里还一直大吼着残忍的话。路人们起初震惊地往后避开，不过后来有些办公室工人和一个跑步者过来把他们拉开了。虽然一个司机的脸上挂着血，两人还是钻回了各自的出租车，接着一切都恢复了原样（p. 12）。

在这一场景中，暴力不再作为需道德审判的例外事件，而是系统日常维护的可计算变量。暴力干预的主体已从制度化的警察机构转移至“办公室工人”和“跑步者”等非专业个体，这印证了控制社会的核心特征——权力通过去中心化的技术节点渗透于日常空间，将偶发冲突转化为即时调控的运算对象。控制社会的稳定性不再依赖封闭的规训装置，而是通过流动的、模块化的信息机器实现秩序再生产。出租车作为移动监控节点、办公室设备作为数据采集终端，乃至路人的智能手机作为信息传递媒介，共同构成德勒兹意义上的“配置”：它们将暴力事件拆解为可处理的数据流，在系

统自愈过程中消解其伦理重量。

克拉拉的橱窗凝视在此过程中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暴力事件的被动记录者，又是控制装置的组成部分。她对暴力场景的持续观察，隐喻着技术系统对伦理危机的冷处理——暴力的“残忍”被简化为视觉信息，其解决过程则被呈现为技术效率的展演：“虽然一个司机的脸上挂着血，两人还是钻回了各自的出租车，接着一切都恢复了原样”（p. 12）。这种程序化处理暴露了控制社会的终极目标：通过将暴力去道德化，使其成为证明系统韧性的反例。当斗殴者回归出租车继续运营时，暴力已被吸纳为维持符号秩序的技术工具，正如废弃 AF 的恐惧被转化为刺激消费的警示符号。

不仅如此，技术装置更通过重构主体认知消解反抗的可能性。在人工智能克拉拉的眼中，办公室工人与跑步者的干预行为，与其说是基于道德责任的行为，不如说更像技术系统预设的应激反应——他们的身份在此刻被简化为“信息机器”的功能组件。控制社会的权力运作依赖于将人类主体降格为技术配置中的可替换零件，其行动逻辑由系统算法而非伦理判断驱动（沈清容，2024，p. 61）。这解释了为何暴力解决后“一切都恢复了原样”：系统通过即时调控维持表面秩序，却拒绝追问暴力根源。橱窗中的克拉拉作为观察者，恰恰就是困于这一认知框架——她对暴力的记录仅服务于技术系统的数据积累，而无法触发任何实质性反思。此种技术认知暴力最终指向符号系统的自我强化。当斗殴司机的创伤被简化为“脸上挂着血”的视觉符号，当废弃 AF 的恐惧被编码为消费警示，伦理价值便被彻底剥离出系统运作的范畴。技术装置通过将暴力事件转化为信息流，使符号差异体系获得物质层面的执行力。橱窗暴力场景由此成为微观的权力剧场：它既演示了技术系统对暴力的高效管控，也暴露了伦理判断在技术理性中的彻底消融。

技术系统对暴力的程序化处理最终需通过认知重构获得合法性，这一过程在镜像误认机制中达到顶峰。当乔西父亲赠予镜子并宣称“这面镜子照出来的是你真正的模样”时（p. 137），他无意间揭示了消费社会中的某种认知暴力：常规镜子的“反像”象征着符号秩序对主体认知的系统性扭曲，而所谓“真实”镜像实为资本精心设计的伪本真性陷阱。消费社会通过制造镜像差异，使主体将符号系统的规训误认为自我本质的发现（龙丹，2018，p. 113）。这种误认在废弃环节表现为双重异化——旧型号 AF 对淘汰的恐惧与父亲将被迫失业称为“解脱”，本质上共享着同一认知结构：前者将新型号奉为理想镜像，在符号等级序列中陷入永久的身份焦虑；后者则将系统预设的淘汰逻辑投射为自主选择，以“解脱”之名合理化符号暴力。

镜像系统的运作机制在于其双向遮蔽性。对于技术物，AF 群体的回避行为暴露了“空无主体”的认知困境：它们的恐惧源于对符号系统等级秩序的无条件内化，却无法识别自身价值已被简化为差异体系中的过时能指。对于人类，乔西父亲的“解脱”宣言则标志着“充实主体”的对象化认同：他将失业解释为主动选择，实则是将符号系统的清除指令误认为自我意志的实现。这种双向遮蔽使暴力从外部压迫转化为内在认知，最终使被弃置者沦为自身命运的共谋者。当克拉拉在废弃后仍执着于太阳能量的救赎叙事时，她正重复着镜像误认的终极形态——通过将系统施加的暴力美化为“仁慈”的自然法则，她将伦理批判转化为维持符号秩序的文化养料。

镜像系统正是通过这种伦理判断的重构消解了伦理反抗的可能性。常规镜子的“反像”持续制造认知焦虑，而特殊镜子的“正像”则提供虚假的认知补偿，两者共同构成闭合的阐释框架。研究表明，这种双重镜像机制使主体陷入永恒的自我修正循环：每一次对“真实”的追寻都强化着符号系统的解释权威。当乔西接受父亲赠予的镜子时，她已无意识认同了技术资本主义的认知框架——

符号系统定义的“进步”与“淘汰”成为了不可违逆的自然法则，人们对系统性暴力视而不见，“从来没有人提意见”（p. 137）。这种认知驯化在废弃环节达到极致：AF 的恐惧被编码为技术迭代的必然代价，人类的“解脱”则被塑造为理性选择的胜利，两者共同将伦理价值压缩为符号差异体系的附属品。

最终，镜像误认使暴力获得美学化的外衣。当乔西父亲宣称“被替代是我遇到的最好的事”时，他的“解脱”非但未挑战淘汰逻辑，反而通过对符号暴力的诗意转译，使剥削转化为可供消费的崇高叙事。这种认知颠覆暴露了技术资本主义最阴险的暴力形态：它不满足于摧毁伦理判断，更迫使主体在镜像游戏中为暴力赋魅。废弃的克拉拉作为观察者与参与者的双重身份，恰是此过程的缩影——她的回忆叙事既是对暴力的无声控诉，却也是系统再生产的话语原料。当太阳的光芒穿透仓库的尘埃，照亮她那早已停机的光学传感器时，所谓的“人性化科技”终于显露出其本质：一个通过符号、技术与认知的三重殖民，将伦理价值彻底异化为资本增殖燃料的暴力机器。

### 结语

《克拉拉与太阳》通过人工智能体的商品化轨迹，暴露出技术资本主义对伦理秩序的殖民化策略。从橱窗中的符号展演到废弃仓库的认知残骸，克拉拉的命运揭示了技术理性主义的内在暴力：资本通过符号差异体系制造永续的淘汰焦虑，借助流动控制装置消解暴力事件的伦理重量，最终以镜像误认重构主体的价值判断。在这一过程中，伦理批判被系统收编为“人性化科技”的修辞装饰，技术物的“悲情叙事”反而成为资本合法性的证明。克拉拉的太阳信仰和废弃结局，构成对技术资本主义的终极隐喻——所谓“仁慈”不过是系统暴力的美学化外衣，而“进步”神话的本质是对生命价值的彻底异化。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 References

- Connors, Clare (2024). “‘Out of Interest’: *Klara and the Sun* and the Interests of Fiction”. *Textual Practice* 38(04): 614 – 632.
- Eaglestone, Robert (2022). “Klara and the Humans: Agency, Hannah Arendt, and Forgivenes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44(01): 1 – 12.
- 蓝江(2021): “走出人类世: 人文主义的终结和后人类的降临”, 《内蒙古社会科学》42(01): 35 – 43+2.
- [Lan Jiang. (2021). “Exiting the Anthropocene: The End of Humanism and the Advent of Post-Humanity”. *Inner Mongolia Social Sciences*, 42(1): 35 – 43+2.]
- 黄莹莹(2023): “人机共同体抑或有机共同体? ——移动性视角下的《克拉拉与太阳》”,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39: 599 – 617.
- [Huang Yingying. (2023). “Human-Machine Community or Organic Community? —*Klara and the Sun* from a Mobility Perspective.”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Review* 39: 599 – 617.]
- Lalan, Du. (2022). “Love and hope: Affective Labor and Posthuman Relations in *Klara and the Sun*”. *Neohelicon* 49(03): 551 – 562.



龙丹(2018):“主体与镜像的辩证关系——镜像认同的三种样态”,《外国文学》(01): 109 - 117。

[Long Dan. (2018).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 and Mirror Image: Three Modes of Mirror Identification". *Foreign Literature* (01): 109 - 117.]

尚必武 (2022): “机器能否替代人类? ——《克拉拉与太阳》中的机器人叙事与伦理选择”,《外国文学研究》(01): 28 - 45。

[Shang Biwu (2022). "Can Machines Replace Humans? — Robotic Narratives and Ethical Choices in *Klara and the Sun*".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01): 28 - 45.]

沈清容 (2024): “何谓机器?——基于德勒兹思想的再理解”,《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3): 89 - 96。

[Shen Qingrong (2024). "What is a Machine? — A Deleuzian Re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03): 89 - 96.]

石黑一雄(2021):《克拉拉与太阳》,宋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Ishiguro, Kazuo (2021). *Klara and the Sun*, translated by Song Qian.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imonetti, Nicola (2024). "Mastering Otherness with a Look: On the Politics of the Gaze and Technological Possibility in Kazuo Ishiguro's *Klara and the Sun*". *Critiqu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65(02): 312 - 323.

唐庆鹏(2021):“大数据时代监视资本主义及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05): 107 - 114。

[Tang Qingpeng (2021).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in the Big Data Era and It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Contemporary World and Socialism* (05): 107 - 114.]

汪行福 (2009):“空间哲学与空间政治——福柯异托邦理论的阐释与批判”,《天津社会科学》(03): 11 - 16。

[Wang Xingfu (2009). "Philosophy of Space and Spatial Politics: Interpretation and Critique of Foucault's Heterotopia Theory". *Tianjin Social Sciences* (03): 11 - 16.]

王文、陶厚兴(2024):“数字资本拜物教的哲学反思——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的视角”,《学术探索》(03): 1 - 10。

[Wang Wen, Tao Houxing(2024).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Digital Capital Fetish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Critique of Fetishism". *Academic Exploration*(03): 1 - 10.]

仰海峰(2004):“消费社会批判理论评析——鲍德里亚《消费社会》解读”,《长白学刊》(03): 53 - 58。

[Yang Haifeng (2004). "Critique of Consumer Society: An Interpretation of Baudrillard's *The Consumer Society*". *Changbai Academic Journal* (03): 53 - 58.]

叶华、朱新福 (2024):“超人类、无分者与机器人:《克拉拉与太阳》中的生命政治书写与技术反思”,《当代外国文学》(04): 97 - 105。

[Ye Hua and Zhu Xinfu (2024). "Posthuman, Unpartitioned Beings, and Robots: Biopolitical Writing and Technological Reflection in *Klara and the Sun*".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04): 97 - 105.]

张一兵(2025):“空间观中的“路德革命”——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解读”,《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62(01): 19 - 33+158。

[Zhang Yibing (2025). "The 'Lutheran Revolution' in Spatial Concep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Lefebvre's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62(01): 19 - 33+158.]

朱梦梦(2024):“后人类时代的“灵韵”:论《克拉拉与太阳》中的复制技术”,《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6(03): 144 - 150。

[Zhu Mengmeng (2024). "The 'Aura' in the Posthuman Era: On Replication Technology in *Klara and the Sun*". *Journal of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6(03): 144 - 150.]